

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研究^{*}

赵俊杰¹, 黄旭¹, 王彤宇²

(1.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2.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金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 其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建立了以培养女真族人才为目的的女真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其中女真字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小学和女真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颇具特色, 对后世的元朝和清朝民族教育有显著影响, 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 金朝; 女真; 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10)01-0014-06

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后, 特别重视女真子弟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女真中央和地方官学, 并发展了女真私学教育, 形成了较完整的女真民族教育体系。对这一教育体系, 目前教育史界尚未认真加以探讨。因此, 本文试作研究, 以期加深对女真民族教育的认识, 探讨其对当今教育发展的借鉴价值。

一、金朝女真民族教育形成的条件

(一) 经济发展和政权建设需要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金朝统治者的封建化措施,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批的猛安谋克(女真族常设的军事组织, 后来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组织)户从东北进入中原地区, 先进的中原封建经济、政治、文化对女真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奚人六猛安, 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 其地肥沃, 且精勤农务, 各安其居”^{[1](P1046)}。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商业的兴盛, 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金朝建国后, 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女真人参政, 以巩固新兴的女真政权。金世宗与宰相的对话就反映了这一要求,《金史·纥石烈良弼传》载:“朕思庶职多不得人, 中夜而寤, 或达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选择, 朕亦密加体察。”良弼对曰:“女直(真, 下同)、契

丹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 然后可。方今大率多为党与, 或称誉于此, 或见毁于彼, 所以难也。”^{[1](P1952)}此后, 金世宗又与宰臣“论猛安谋克官多年幼不习教训, 无长幼之礼, 曩时乡里老者辄教导之。今乡里中耆老有能教导者, 或谓事不在己而不问, 或非其职而人从不。可依汉制置乡老, 选廉洁正直、可为师范者, 使教导之”^{[1](P1953)}。由此可知, 女真人缺少文化素质较高的行政官员, 而无法胜任管理广大地方事务的职责, 是促使金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学以加速培养人才的直接动因。

(二) 创制女真文字, 翻译汉文典籍, 为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 开始并无文字, 金朝建立后, 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女真文字随之产生。“金人初无文字, 国势日强, 与邻国交好, 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 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 因契丹字制度, 合本国语, 制女直字。”^{[1](P1684)}此即女真大字, 在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金熙宗完颜亶统治时期, 又有女真小字制成, 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文字的出现, 催生了女真学校的诞生。

女真虽有文字, 却没有用女真字写成的书籍。为了满足由女真文字激发的对知识的渴求, 他们转而学习汉文书籍。金世宗即位后, 积极倡导并组织

* 收稿日期: 2009-10-26

作者简介: 赵俊杰(1962-), 男, 河北饶阳人,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黄旭(1982-), 男,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王彤宇(1975-), 男,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历史学。

翻译了汉文经史书籍。女真文字不仅成为女真民族教育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成为女真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表达形式,提高了女真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1] (P2185)}。“十五年,缔达迁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6] (P2186)}。章宗时专门“置弘文院,译写经书”^{[1] (P232)}。《金史》所载译成的女真文字汉籍多为儒家经典、诸子与史书。这些书籍大大丰富了女真人的精神世界,为女真教育提供了大量的教材资源。

(三)对汉族文化态度的转变为教育提供了政治保证

女真族占领辽和北宋广大地区后,开始并不认同汉族文化,他们在占领区经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结果使女真族自觉不自觉地向较高水平的汉族学习,逐渐汉化。同时,女真贵族为了稳固政治上的统治,也逐步认同汉族文化,承认儒学在文化领域内的核心地位。

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女真贵族宗翰率兵攻占山东地区。在进军曲阜时,因《论语·八佾》中有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被女真族认为是对他们的鄙夷和谩骂。因此,金兵不仅对孔庙中的孔子像大骂,而且放火烧毁孔庙,更有甚者还要掘孔子墓,幸好被已降金的渤海人高庆裔阻拦,宗翰才将士兵制止,反映了女真人对孔子的粗暴态度。但是,金朝急欲得到汉族及其他各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在天会元年(1123年)开科取士,录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政权。这些应举之人大都是儒学子弟,他们崇敬孔子。金朝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奠定了金朝政府尊孔的基础。

由此可见,金初统治者在文化上并没有承认儒学的统治地位,当时的开科取士只不过是增添地方官员、稳定统治的政治手段。随着金与南宋疆域的划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金朝很快就改变了原有文教政策。金熙宗完颜亶于皇统元年正式下诏:“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1] (P77)}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金朝的首都)立孔庙,亲自拜祭。天眷三年(1140年)又封孔子的四十九代孙孔璠为衍圣公。孔璠死,其子孔拯延袭了爵位,政府承认孔子家族世袭特权地位,实现了从鄙视孔子到尊孔的转变。此后历代皇帝不断拓

宽尊孔的途径,扩大尊孔的范围。章宗时期,在各地普建孔庙,树立了全民尊孔的风气,同时规定臣民要避孔子讳等。孔子在金朝同样被抬高到与宋朝相同的地位,成为统治思想的精神偶像。承认儒学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认同了汉文化,女真族才能够依照汉族的文教体系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事业。

二、女真民族教育的创建和发展

女真民族教育是建立在对汉族教育继承和学习的基础上的。随着女真人的不断汉化,他们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接受了汉族的制度,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模仿汉族教育体制创建女真族教育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女真官学

女真官学是指由金朝政府建立的以教授女真人为主的各级各类学校,主要包括女真字学、女真中央官学和女真地方官学。

1. 女真官学的种类

(1)女真字学

女真文字的诞生是女真民族教育史上的大事,而文字的传播有赖于固定人群的使用。因此,金朝统治者在颁行女真文字的同时,也相应着手建立教授女真语言文字的学校——女真字学。女真字学开办的具体情况,《金史》记载的并不明确,我们通过其中一些分散的资料大概可以勾画出女真字学的基本概貌。首先,女真字学创立的时间不应迟于金太宗天会年间(1123—1134年)。“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卯,俱在选中”^{[1] (P149)}。这是记载女真字学最早的史料,表明女真字学在天会年间已创立。其次,办学地点是上京和地方都有,并且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等级差别。“纳合椿年,本名乌野。初置女直字学,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1] (P1872)}。纳合椿年刚开始学习女真文字是在西京(今山西大同),很明显是一个地方性质的女真字学。随后在天会年间进行了一次选拔,在地方学习优秀的学生如纥石烈良弼和纳合椿年都被选送到上京的女真字学继续接受教育。再次,学生来源。女真字学主要招收猛安谋克中的女真族儿童,“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即是明证。同时,从极力宣扬女真文字扩大教化的目的出发,也招收了部分汉族和契丹族等其他民族的学生。“曹望之,字景萧,其先临潢人……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年十

四,业成,除西京教授”^{[1](P2035)}。“移刺道,本名赵三。其先乙室部人也……通女直、契丹、汉字”^{[1](P1966)}。这些学生以儿童为主,曹望之十四岁就是西京女真字学的教授,那么入学的年龄就更早了。第四,师资。女真字学的教师有两类:一类是创立女真文字的女真高官,主要集中在京师的女真学校,如纥石烈良弼在上京拜见的完颜希尹,纳合椿年“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的耶鲁;第二类是最早一批接受过女真文字教育的佼佼者,学成之后被任命为教师,如纥石烈良弼十五岁为北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教授,曹望之十四岁为西京教授。

金太宗天会年间,正是金与北宋交战最激烈的时期,金朝的教育发展既没有明确的文教政策指导,也没有稳固安定的政治局面。然而,女真字学却极受金朝政府的重视,金太宗亲自到学校考察女真字学学生的学习情况。“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1](P1615)}。女真字学是女真民族学校教育的萌芽和雏形,是女真对汉族文教体系学习的初步结果。虽然同金世宗大定年间兴办的女真中央和地方官学相比显得十分不系统、不正规,但它的设立极大地提高了女真人的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女真人才,为进一步发展女真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2)女真中央官学

金朝女真中央官学包括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和女真小学。国子监是在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设立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女真中央官学始设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1](P1133)}。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命建女直大(太)学”^{[1](P200)}。从现有史料来看,女真国子学是对太宗天会年间设立的女真字学扩充和升级的结果。“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P1133)}。这次用女真大小文字翻译的书籍多为《贞观政要》、《史记》、《西汉书》等经史书籍,极大的丰富了女真字学的教学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单纯学习语言文字的藩篱,使女真字学发展成为文字与经史并重的教育。女真字学已经不能适应女真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创建更高级别更为正式的女真学校便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女真国子学就应运而生了。女真太学是女真民族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创建于1189年,教

学和管理达到了较高水平。考虑到女真族上层贵族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年龄较小或水平很低,一时还学不了国子学和太学的课程,所以,金朝在女真中央官学中设有女真小学。“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1](P1133)},说明当时女真国子学中所养学士200人中,策论生和小学生各占100人。女真小学是女真国子学的一种附属教育机构。

(3)女真地方官学

女真地方官学是在大定年间伴随着女真中央官学的发展而建立的正规的地方官学体系。《金史·选举志》载:“诸路设女直府学……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这些女真府学大部分集中在原女真故地以及契丹族和女真族聚居的东北、内蒙等地,同金在汉族较集中地区设立的京府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相对应,满足了女真子弟的学习要求,有利于女真族文教事业的发展。

2. 女真官学的管理制度

金朝设立的女真官学制度完备,管理严格,比以前所设的女真字学更加规范,表明女真在向汉族教育学习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1)学生入学资格

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和女真府学主要招收女真的宗室贵族及富家子弟。“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1](P1134)}。同时,政府规定:“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1](P1134)}因此,对于国子监隶属学校和其他府学、州学入学资格的规定同样用于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和女真府学。国子监“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1](P1131)}。府学、州学“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分之一”^{[1](P1131)}。这些女真学校从建立伊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等级的烙印,用法定的形式保证了女真官僚子弟的教育特权。

(2)教师任用

金朝政府极为重视女真官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朝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论取人,有27人登第,在女真族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批进士。这批人很快被分配到中央和地方的女真官学中任教。“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

授”^{[1] (P2186)}。随着女真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丙午,制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给俸与丞簿等”^{[1] (P200)}。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又“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1] (P211)}。这就明确规定了地方女真官学教师来源和校长人选。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还规定以“训导有方,生徒冲业”^{[1] (P1228)}作为考察和评价教师的标准。当时,女真学人已经能够和汉族知识分子一起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民族教育比前代的辽国有了长足进步。

(3)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金朝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国子监,隶属于礼部。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和太学,“国子监。国子学、太学隶焉”^{[1] (P1271)}。女真国子学、女真小学、女真太学同样受国子监的管理。国子监设祭酒和司业掌管学校事务,“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掌学校”^{[1] (P1271)}。此外,还有两名国子监丞作为辅助工作人员。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又增设一名国子监丞专门管理女真学校。“丞二员,从六品。明昌二年增一员,兼提控女直学”^{[1] (P1271)}。此外,教学所用的书籍“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1] (P1132)}。由此可知,国子监不仅管理教育的日常行政事务,还负责女真学校的管理工作,从而建立了较完备的教育管理体制。尽管这个教育管理制度是模仿汉族教育体制建立的,但对女真族教育的发展却有积极意义。女真国子学下设博士、助教、教授、校勘、书写官等职。“国子学。博士二员,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员、考艺业。助教二员,正八品。教授四员,正八品。分掌教诲诸生。国子校勘,从八品。掌校勘文字。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1] (P1271)}。博士、助教和教授是专职的教学人员,他们拥有考核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权利。同时,他们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诲诸生”。校勘负责对书籍和学生作业做文字上的甄别,书写官的职责是如实记录当时国子学日常教学的情况。

女真太学创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四月)癸未,命建女直大学(太学)。五月丙午,制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给俸与丞、簿等”^{[1] (P200)}。女真太学设有教授一职,其待遇与国子监监丞和主簿相同。担任教授者必须是“高才宿儒”,可见,选拔教授的条件是较严格的。此外,设有博士和助教,教学行政工作大致和女真国子学相同。

女真地方官学设女真教授掌管地方教育事宜,这些女真学校有明确的课业安排和管理规定,“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1] (P1134)}。汉族学生“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1] (P1132)}。由此可见,其管理层面已经深入到学生的学习计划、假期、惩戒以及肄业后的走向。同时,金朝政府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以满足朝廷取士之用,于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颁布《更定贍学养士法》,规定:“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1] (P257)}即使在金朝后期连遭蒙古侵略、军费不济的情况下,学生廪给仍然按时发放,保证了女真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这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教育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的做法十分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 女真私学

金朝女真私学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女真私学教师为汉族大儒,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教授知识,使用汉语教学。学生群体以女真子弟为主,兼有汉族、契丹等其他民族学生。“张用直,临潢人。少以学行称。辽王宗干闻之,延置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1] (P2314)}。根据《宋史》记载,金朝多次扣押来访的宋朝使节,迫使其向女真子弟传授知识和学问。“张邵,其在会宁,金人多从之学”^{[1] (P11556)}。其中最有名的是洪皓,在金朝滞留十五年,不仅教授女真贵族完颜希尹的八个儿子学习儒学,所著诗文也使金朝普通民众争相抄诵。第二类私学是以女真学人为老师,学生几乎全部是女真人。教学用语为女真语和汉语,多存在于皇室贵族之中,这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双语教学。世宗的孙子完颜承庆就因为好学,“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1] (P2056)}。这类私学是女真贵族子弟学校,相比其他形式的私学受重视程度较高,师生礼制与汉族私学做法相近。“命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因赐酒及彩币。顷之,世宗诏匡、讹可俱充太子侍读”^{[1] (P2163)}。皇族子弟也要对老师行拜师礼,表明教师地位崇高,尊师重教于此可见一斑。第三类

私学是指女真人的自学。他们一般没有固定的老师,自学女真、汉、契丹等多种民族语言,此外,还学习儒学经史,兼习骑射。金初开国重臣完颜宗雄“好学嗜书”,狩猎中被误伤,在家休息两月,苦学契丹文字并达到很高水平。金朝末年,抗蒙名将完颜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1] (P2680-2681)}。这类女真私学从金朝立国伊始就存在于女真族内部,广泛地传播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知识,极大地改变了女真人的民族心理。

金朝大力创办民族教育,使女真族进步迅猛。到金朝后期,女真族不仅是讲究武功骑射的狩猎游牧民族,同时也成为普遍重视学习文化知识的民族。女真人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使其很快融入民族融合的大潮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的特点

金朝女真民族教育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汉族先进的文化内涵,并结合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将其融合、消化、吸收,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学习性

女真民族教育是以汉族文教体系作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完颜希尹所创的女真大字,部分依仿了汉字的楷体。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和女真府学的学生入学资格、行政管理、教学计划等,明显学习了唐、宋的官学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受汉族影响更明显,各级各类学校所用教材都是用女真大小字翻译的儒学经典和史志文献。正如世宗所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 (P184-185)}女真私学更是以汉族的家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金朝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女真学人的不断努力,使女真族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建立了体制较完备的女真民族教育体系。其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教育中的一大奇迹。

(二)民族性

不忘女真旧俗是金朝政府文教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金世宗是女真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在位期间颁布措施保护女真旧俗。他训诫宗室和朝中重臣:“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

也!”^{[1] (P164)}明确规定猛安谋克不习女真语不能世袭官职和爵位。金朝政府用女真大小字作为书面语言,开策论考试,设女真进士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少数民族进行的科举考试。将科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女真民族的学习积极性。

金朝政府非常重视女真儿童教育。先设女真字学招选儿童学习本民族语言,培养民族意识。后又在中央的女真国子学创立女真小学,以便于女真贵族子弟从小就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女真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得以保存下来,使其民族特色得以延续。

(三)缺乏创造性

尽管女真民族教育取得了不小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缺点和失误。其中最突出的是创造性不足,学校教学内容和本民族传统相脱节。女真族是游牧狩猎民族,同中原汉族的传统习惯迥然相异。女真族学人在翻译汉族的经史子集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却没有深入挖掘和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女真文学、风俗、音乐的书籍寥寥无几,游牧民族的骑射技能也未纳入学校教育的范围。这就阻止不了汉族的意识形态假借女真学校教育在女真族内部迅猛传播。不会说女真语,改穿汉服,用汉姓的女真人越来越多。因此,女真教育到金朝后期就越来越显得后劲不足,发展迟滞,加速了女真族在心态上向汉族趋同,女真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意识随之减少,逐渐成为女真族汉化的助推器。这对女真民族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却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进步意义。

四、女真民族教育的影响

(一)对金朝的影响

金朝兴办女真民族教育,为政府培养了大批可用之才,使女真人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崭露头角,同样在文史编修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金史·文艺列传》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元代的史官们充分肯定了金朝在文治方面的成就。女真民族教育的发展在短时间内缩短了女真族同汉族在文化上的差距,大大提高了女真族的知识文化水平。辽国尚无契丹人担任中央官学教师职务,而金朝女真族

学人却可以和汉族学者同堂教学了,这是女真民族教育的成果。同时,金朝政府在地方设立了22所女真府学^[1](P1133-1134),这些学校多在东北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其中许多地方从未受到过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女真府学不仅传播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知识,而且将东北边疆和中原内地在文化上更为紧密的联系起来,潜移默化的起到了在东北地区传播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作用。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完整、增强民族凝聚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对后世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金朝女真民族教育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先河,后世的蒙古族和满族都从女真民族教育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首先,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教育的认可越来越主动,蒙古人在对金的军事行动中就高举尊孔大旗,至元武宗时则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女真族有着民族渊源的满族在建立清朝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尊敬孔孟,崇尚理学。说明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无论什么民族,尽管他们在服饰、语言、发型和生活习惯上与汉族有很大区别,但在文教政策上却没有太大改变,都尊孔读经,进行儒家教育。其次,元和清的统治者也仿照女真族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蒙古族和满族的教育体系。元朝设立了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清朝为八旗子弟专门建立了八旗官学。这些举措显然都受到了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三)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文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是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群体的,积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生命力,创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教育体系,深入挖掘他们的文化底蕴,是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女真族在发展民族教育上的历史经验,创建各民族共同需要的教育体系。通过继承和发展,使少数民族教育充分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世界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各国文化教育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是在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习他人的先进优秀的教育经验和方法,无疑是提高本国教育水平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外来教育,而不深入挖掘本民族教育的优良传统,教育很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其后果可能会导致本国教育民族特色的渐趋消亡。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教育遗产,如何用好这笔财富,将其巧妙地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既是当代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也是时代赋予文教工作者的重大历史使命,更是复兴中华民族的迫切需要,值得深思。

O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es of Manchurian minority in Jin dynasty

ZHAO Jun-jie¹, HUANG Xu¹, WANG Tong-yu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Jin dynasty is founded by the Manchurian minority in ancient China. Their education is special in that both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 schools in variety are established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This is quite influential upon the education in the oncoming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Jin dynasty; Manchu;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范玉凤]